



陈方 编著

全球化、性别与发展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项目专项资助

全球化、性别与发展

陈 方 编著



内容提要

本书探讨性别与发展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历程、基本内容和方法。性别与发展是交叉于妇女/性别研究与发展研究两个不同领域之间产生的新的知识。作者从三个不同层面梳理了这门知识：其一，性别与发展产生的历史背景；其二，性别与发展经历了“妇女参与发展(WID)”和“性别与发展(GAD)”两个阶段；其三，性别与发展有战略性和工具性两类方法。这两类方法广泛运用于性别与发展项目中，对于实现性别平等和推动妇女发展具有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全书除导言和附录之外，共分为十一章。导言部分交代了著者的写作目的、逻辑思路、各章之间的关系和主要内容。

本书为从事与发展研究、女性/性别研究相关的理论研究者、相关研究机构的工作人员、妇女工作者、大学教师、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学习资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性别与发展/陈方编著.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5618-3225-7

I . 全… II . 陈… III . 妇女学 - 研究 IV . C913. 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0391 号

组稿编辑 田菁 装帧设计 郭泉
责任编辑 张颖 技术设计 油俊伟

出版发行 天津大学出版社
出版人 杨欢
地址 天津市卫津路 92 号天津大学内(邮编:300072)
电话 发行部:022-27403647 邮购部:022-27402742
网址 www.tjup.com
印刷 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185mm × 260mm
印张 13
字数 357 千
版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
定价 22.00 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烦请向我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中华女子学院是目前全国高校中开设女性学课程最早的一所院校。早在 1984 年,当时学院的妇女运动系就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中外妇女运动史”、“妇女心理学”、“妇女工作管理”等课程,先后出版了一系列教材。2001 年,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女性学系,从此开始了女性学教学的系统化、规范化建设。这个系统化、规范化建设过程主要涉及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两个方面。2002 年,中华女子学院与香港中文大学和美国密歇根大学合作,开办了中国第一个女性学研究生课程班,开设了“女性主义理论”、“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妇女史”、“女性与当代中国社会”等六门课程。2004 年,面对全校本科生,开办了女性学(辅修)专业,开设了“女性学导论”、“中外妇女运动史”、“女性学理论”、“女性主义研究方法”、“性别发展与公共政策”、“性别与婚姻家庭”等十几门女性学课程,出版了教材《女性学导论》、《女性学》和辅助教学片《熟视无睹的性别偏差——媒体中的性别》及《耳濡目染的民俗文化——人生旅程中的性别》。2006 年,教育部批准学院开设了中国第一个女性学本科专业。20 多年来,学院一直在教学研究与实践活动方面,尝试和探索建设中国的女性学。多年来,尽管我们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学科建设上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仍感到女性学在理论框架、研究方法、课程体系、教材建设及学生培养等方面与成熟学科之间存在差距。2005 年,在北京市教委的支持下,中华女子学院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再次启动了女性学学科建设项目,目标是建立女性学专业基础课程体系和加快教材建设,《中外妇女运动简明教程》、《女性与民间组织的发展》、《全球化、性别与发展》这三本教材就是这个项目的一部分成果。几位作者都是该研究领域的长期耕耘者,她们不仅有该领域扎实的理论功底,而且有该领域多年的教学经验,呈现给读者的这几本教材,就是她们多年来的研究和教学心血的结晶。

女性学学科建设任重道远,作为全国妇联的一所高校,学院一直将推进女性学学科建设作为己任,同时也愿意为各位同人搭建一个共同发展的平台,共同构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有生命力和充满活力的中国女性学学科。

中华女子学院院长

张李玺 教授

2008 年 1 月

导言

性别与发展既是妇女/性别研究又是发展研究的分支领域,时至今日,性别与发展已在上述两个领域延伸开来。当我们进入妇女/性别研究领域循着其发生和成长足迹一路探究,一幅宽广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展现于眼前,同时可见一条清晰的学术演化脉络。本书的主要任务便是描述性别与发展的背景,阐述其演化脉络、结构和内容。从历史上看,性别与发展经历了“妇女参与发展”和“性别与发展”两个阶段;从结构上看,性别与发展有三个不同层面的内容。这三个层面的内容包括:其一,性别与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观进化和妇女运动全球化的产物,也是人类发展观进化和妇女运动全球化的内容;其二,性别与发展在理论上可区分为“妇女参与发展(Women in Development, WID)”和“性别与发展(Gender and Development, GAD)”两个形态,而在发展实践中,从WID到GAD是难以分开的连续过程;其三,性别与发展在实践中开发了一系列方法,它们是实现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的有效的可操作的工具。

(一)

20世纪后半叶,随着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全球化特征日益显著,人类发展观从以GDP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转变为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观。人类发展观的变化,促使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从联合国大会到各国首脑论坛,从国际公约到行动纲领,从各类国际机构的资助项目到国与国之间的相互援助,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成为全球议程和国际事务中日趋重要的议题之一,逐渐形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与此同时,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潮流推动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实现性别平等促进妇女发展,使男女两性平等地参与发展并从中受益,是一切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与终极目标之一。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人类发展观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论”。在发展领域,它表现为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这体现在联合国第一个十年发展规划(1961—1970年)中。事实上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当时对促进经济增长、迅速积累财富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经济增长并不会必然带来收入分配的改善和社会结构的完善,不能反映技术进步的变化,也没有给人们带来所期望的福祉,相反,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了,物质财富增加了,却造成了经济比例失调、贫富差距拉大、资源日益枯竭、环境日益恶化等严重问题。

20世纪60年代,正当工业国家陶醉于战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随之而来的“高消费”的“黄金时代”时,资源、环境、人口等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日益尖锐和全球化。这类“人类困境”问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深层次的对人类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反思、总结和探索。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发出了关注环境

污染的第一声呐喊；1968年，“罗马俱乐部”开始探讨一系列关乎增长和决定人类命运的根本性问题，并对原有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四年后该组织提交的报告——《增长的极限》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报告中以各种数据和图表有力地证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但使人类与自然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并且将继续不断受到自然的报复。报告也给出了一个激烈的解决方案：零增长。零增长理论又被称为增长极限论，它认为：人口数量、粮食生产、投资规模、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具有按指数增长的性质，如果按这个趋势继续下去，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在今后100年内的某个时期将达到极限。这个论证为后来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尽管增长极限论被认为是悲观论，但它是人类对今天高生产、高消耗、高消费、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首次认真反思。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中，首次清晰地表达了可持续发展观，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的需求，又不对后代满足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模式。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观得到了全球持不同发展理念的各类国家的普遍认同。

早在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第一个十年发展规划就受到了严厉批评。批评者认为：由于这个规划严重忽视了环境、资源因素以及社会发展的内容，经济增长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多数发展中国家没能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而改善社会的各个方面，出现了没有发展的增长局面。个别国家还出现了“贫困性增长”的局面。在联合国的第二个发展十年期间，人们开始反思对“发展”的理解，贫困问题、失业问题和社会不均等社会问题得到关注。与此同时，综合发展观逐渐确立。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1971—1980年)报告指出：发展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社会福利设施的改善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1983年联合国推出《新发展观》一书，提出了“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新发展理论，此后在这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综合发展观。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年度报告中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发展概念，其发展研究开始关注人类自身，包括教育、识字率、健康和媒体等社会指标。人们对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即增长不等于发展，发展是经济社会各方面综合协调发展的系统过程。

随着人类发展观的变化，国际社会对于公平、公正、平等的呼声越来越多，并坚持不懈地推动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人类在追求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的进程中，成为全球热点问题的不仅有政治、经济、科技环境等问题，以区域传统文化为主导的一些社会问题也成为全球的研究重点，妇女/性别问题正是其中之一。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妇女问题日益突出，历史上形成的大量男女不平等现象并未因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减少，新自由主义经济现实又滋生了许多新的男女不平等现象，这些现象集中在以牺牲妇女权益换取短期经济利益，同时，持续的男女不平等现象，浪费和破坏人力资源，增大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成本。早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的推动，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规划把“将妇女全面综合到发展进程中”作为发展战略之一。妇女运动渐渐成为全球化现象之一，这主要表现为几点。其一，联合国相继通过了一系列国际条约，消除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妇女产生的不利影响正逐步被纳入各国政府的重要议程中。其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联合国先后召开了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了一系列行动纲领，建立了一系列维护妇女权益的全球性标准。其三，进入20世纪90年代，妇女问题成为全球议程上日趋重要的课题，性别公正和妇女问题数次进入联合国各重要大

会、世界首脑会议的议事日程。其四，联合国提出了一系列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的目标、指数，确立了监测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的全球统一尺度，并每年公示监测结果，报告和评述全球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进展。其五，“性别平等主流化”成为全球性战略，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尊重和保护人权、实现社会公正、真正体现效率和公平的新的可持续发展观。目前，许多国家已承诺性别平等主流化是促进性别平等的一项战略行动。最后，大量的跨国和跨地区的非政府的妇女组织不断出现，它们利用高科技技术有组织地积极参与决策、参与发展进程。21世纪，提高妇女地位、维护妇女权益、推进男女平等和促进性别公正已成为世界潮流。

(二)

当妇女运动逐渐全球化之时，以怎样的方式采取和怎样的策略推动妇女发展促进性别平等，成为不同国家和地区“女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实践表明，对这个问题所采取的态度和立场主要取决于以下四方面：所在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目标和方式；所在社会和文化中女权主义（男女平等）理论和方法的发达程度；所在国家或地区以往妇女运动的传统方式；所在国家和地区妇女群体的异质性的强弱。三十多年来，一些政治活动家、女权主义者和发展学专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坚持不懈地探索发展中国家妇女发展的政策和途径，性别与发展先后在理论和政策上出现了两种形态，这就是“妇女参与发展”（WID）、“性别与发展”（GAD）。两者发源于妇女运动、女权主义理论、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理论和实践，以发展项目的形式被运用到发展中国家，并随着发展中国家妇女发展实践的进程而发展。

有文献资料表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发展计划和项目从来没有考虑过女性。在联合国的第一个发展十年间，埃丝特·勃斯鲁普（Ester Boserup）及其同事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妇女之间的关系，1970年，她发表了《女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书，描述了殖民化和现代化如何使女性处于边缘化的过程，第一次用量化的方法告诉世人如下三点研究结果：第一，妇女是生产劳动尤其是农业生产劳动的主体；第二，官方统计中没有反映妇女的作用，社会忽视了妇女在经济方面做出的贡献；第三，妇女的劳动场所大多在家庭中或属于非正规就业部门。她据此做出如下基本假设：在发展中国家，妇女还没有充分参与现代化进程，妇女一方面在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却在殖民化和现代化过程中被边缘化，在这种状况下，妇女不可能在现代化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获得解放。同时指出，当时绝大多数国际援助项目（发展项目）并没有充分认识妇女的真实处境，在客观上忽视了妇女的经济参与的重要性，因而没能在政策上和发展干预行动中有效地改变妇女的边缘化处境和阻止“贫困女性化”现象的蔓延。“妇女参与发展”认为，应该充分发挥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国际援助发展项目应该努力采取各种途径，包括通过非正规的教育和培训来提高妇女地位；主张用法律手段保护妇女参与发展；强调项目工作人员中女性的比例，以便发展项目能更好和更多地关注目标人群中妇女的利益和参与；强调通过福利途径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妇女；主张利用效率途径来促进妇女发展。“妇女参与发展”在各类发展项目中倡导和推行的公平途径、反贫困途径、福利途径和效率途径，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充分参与并受益于发展过程（现代化进程），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联合国妇女十年期间（1975—1985年），不仅世界银行的重点项目关注妇女的基本需求，其他一些国际发展机构和一些国家的政府发展机构及非政府组织所资助的项目，在项目机构设置中也纷纷设立了妇女参与发展（WID）办公室。

20世纪80年代，一方面，发展的含义从经济增长扩展到了政治、文化、技术、资源与环境

等不同的领域,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社会群体之间的平等和公平,包括性别平等与性别公平,另一方面,性别(gender)概念在发展学领域普及开来。从事国际援助项目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在接受“gender”的过程中,通过对援助项目实施效益的反思,逐渐扩展了关于妇女问题的视域;现代化、发展以及社会变迁等问题,对于妇女的影响一般不同于男性,进而关于妇女与发展论题,逐渐从单纯的妇女分析视角扩展到对于男女两性的社会关系以及影响这种关系的各种社会因素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和实践者不断修改发展框架、发展政策和建构发展工具,促使“妇女参与发展(WID)”演变为“性别与发展(GAD)”。

如果说妇女参与发展源于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和现代化理论,那么在此之后的“性别与发展”则源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于WID的批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发展应当是全人类的发展,应当把人放在发展的中心位置,而不应当仅仅强调经济增长。为了达到男女共同发展,应当调整原有的社会性别结构。沿着这条思路,GAD认为,妇女对经济有贡献却在发展中被边缘化,不仅是因为妇女没有充分参与发展,而且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现存社会存在着不平等的性别结构或机制。因此,应该进一步揭示不平等的性别结构或机制以怎样的方式如何妨碍妇女参与发展?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和途径减少障碍?

GAD从男女的社会属性出发分析性别关系,详细地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妇女在家庭、社区和生产中的三重角色,同时考虑这些角色与男性角色之间的相互影响,即考虑性别关系的互动结构,由此提出了劳动的性别分工这一重要论题(尽管当时还没有完全展开)。GAD还建立了性别利益、性别需求的概念和满足两种性别需求的策略,进而探讨了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如何决定男性和女性参与、控制和获益于发展计划、发展资源和干预行动。GAD把妇女看做制定和执行法律、计划和政策过程的积极参与者而非被动接受者,因而在政策途径上强调妇女赋权,以增强妇女的权利和能力。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前期,卡罗琳·摩塞(C. Moser)及其同人发表了多篇著述,在质疑WID的同时,阐述了GAD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对国际发展和援助机构,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妇女与发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3年以后,GAD话语已被发展学领域接受。尽管人们已在理论上和方法上了解了WID和GAD的区别,但一些从事性别与发展研究工作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作者,在实践中对于区别WID与GAD的认同感较弱,在他们看来,性别与发展项目从计划到执行再到监测和评估,往往同时混合使用WID和GAD的观点和政策,在这个过程中,两者的目标、途径和方法的界限往往是不清晰的。这种现象也许正好表明: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理论、道路和方式的选择应该因时、因地制宜;本土化和从本国本地区妇女现况出发来确定和执行妇女发展规划、政策和策略,既是从事妇女与发展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又是性别与发展得以进化的内在动力。

(三)

在性别与发展领域,经过女权主义者和发展学专家几十年的不懈努力,逐渐开发出一系列分析工具,借助它们,一方面可发掘出妨碍妇女充分参与社会的根源,找出导致妇女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政治、文化等结构性原因,从而制定出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政策、策略和措施,另一方面可确保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政策在项目的计划、执行、监督和评估各环节中得以落实。

就方法论而言,性别与发展领域的办法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战略性方法,包括性别平等主流化和妇女赋权。性别平等主流化和妇女赋

权是沿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径却是同样重要的两个战略。性别平等主流化是指在法律、政策、计划和项目中自上而下地贯穿性别平等主线，妇女赋权则是指在制定和执行政策、计划和项目的全过程中，注重妇女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注重增强妇女的权利和能力。性别平等主流化强调政府、法律和政策对于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的推动功能，妇女赋权则强调妇女草根或基层组织和妇女自身对于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的能力、潜力和作用。强调性别平等主流化的自上而下的战略，强化了各国和各级政府对于性别平等的责任；强调妇女赋权的自下而上的途径，则带来了大量的妇女非政府组织的产生和妇女“有组织”地普遍参与发展的现象。在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性别平等主流化被联合国确定为促进性别平等的全球性战略，同时，《北京宣言》提出妇女赋权是妇女发展的关键，是实现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基础。

第二个层面包括四种工具性的方法。首先是性别分析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性别分析的作用，不在于它在理论上的贡献，而在于它的可操作性，在于用它描述和分析熟视无睹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时，可揭示现象背后的原因。三十多年来，性别与发展领域出现了多种性别分析框架，以至今天，我们已经能够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以及研究目的，选择和组合自己需要的性别分析方法。其次是性别计划。在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负责发展计划的权威机构非常不愿意承认性别是计划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逐渐认识到为了实现事实上的男女平等，在发展规划和项目计划中采取性别计划方法是非常必要的。性别计划是帮助实际计划工作者将性别意识转化成实际行动的可操作性的工具。性别计划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将计划过程性别敏感化（或对性别意识的强化），实现性别公正。再次是性别统计。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发展观和方法论的一系列变革，在统计领域，性别统计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缺乏性别意识到性别敏感、从被排除在国际发展目标之外到被纳入联合国社会发展目标的指标体系中的过程。性别统计是以实现性别平等为目的，运用统计特有的方法和手段，描述、分析和测评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参与、贡献以及社会性别差异，以期为政府决策和相关研究提供数据支持的一种基本方法。性别统计在性别研究以及发展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工作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后是性别预算。性别预算又名社会性别敏感预算，它是指从性别角度出发，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公共支出进行分析，看它对女性与男性有哪些不同的影响。政府为了实现人的发展和男女平等，可借助性别预算方法做出哪些公共资源需要再分配的决策和决定。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要求各国政府展开性别预算，以求至少在公共资金的分配方面能够为男女平等做出一些贡献，加速男女平等的进程。

上述战略性工具性方法，广泛运用于性别与发展项目中。性别与发展项目是干预项目，性别与发展项目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妇女专有项目；第二种是妇女子项目，即综合项目中含有专门的有关妇女的项目内容；第三种是性别敏感型项目，即项目的全过程都具备性别意识并将其“主流化”。三类项目通过干预现实中性别不公正，改变妇女处于弱势的状况及其形成的面貌，在逐步满足现实性别需求和战略性性别需求的过程中，趋向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

（四）

本书探讨了性别与发展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历程和基本内容和方法。除导言和附录之外，全书分为十一章。第一章，人类发展观及其变化，介绍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发展观所经历的变化：从经济增长论到增长极限论；从循环经济论到人与客观世界相协调的发展观；

从可持续发展观到以人为本的人文发展观；最后讨论了中国的科学发展观。第二章，全球化与性别公正，阐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高的对于性别公正和性别平等的呼声，讨论了联合国相继通过的一系列国际条约和行动纲领，召开的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多次把性别公正、性别平等、妇女问题纳入世界首脑会议的议事日程，以“全球化”的方式提高妇女地位、维护妇女权益、推进男女平等，促使性别公正成为世界潮流。第三章，性别平等发展的指数，分别介绍了人文发展指数、性别发展指数、性别赋权指数和千年发展目标，探讨了这些指数对于性别平等发展的意义以及性别发展指数的计算方法和应用。第四章，性别平等纳入决策主流，介绍了性别平等主流化的产生背景、意义、内涵及其战略框架，并分析了相关案例。第五章，从“妇女参与发展”到“性别与发展”，分别讨论了两者的来源、基本内容、主要区别和联系。第六章，性别分析，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性别分析框架和方法进行了讨论，包括对参与式性别分析方法的探讨，并通过实例详细介绍了性别分析作为分析工具在实践中的运用，最后简单介绍了几种经典的性别分析框架。第七章，性别计划，描述了具有性别意识的计划方法的发展历程，介绍了性别计划的理论假设、目标，性别角色与两种性别需求，以及它作为一种工具的操作过程。第八章，妇女赋权，主要在三个层面上讨论妇女赋权：妇女赋权是一个目标，即获得和增强妇女的权利和能力；妇女赋权是一个过程，是改变不平等性别关系的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妇女赋权更是一种促进妇女发展的战略。妇女赋权被广泛地运用于妇女运动和国际国内发展项目之中，体现在性别与发展实践过程中。第九章，性别统计，讨论了性别统计的概念以及产生和发展的历程，具体介绍了性别统计中常用的测量指标，描述了性别统计的生产过程，并对性别统计的案例进行了分析。第十章，性别预算，主要介绍性别预算的概念和目标、性别预算的框架和内容、性别预算的操作、性别预算的作用和施行性别预算的几个典型例子。第十一章，性别与发展项目，主要讨论项目及其类型、性别敏感项目，循环过程中的性别整合、项目规划和项目监测与评估，最后介绍了项目申请书的写作。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笔者参考了国内外大量文献及有关研究成果，在此对有关著作深表感谢。另外，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专业本科生曾莹、汪瑾、张茜、吕倩、丁玉、许文博、彭丽娅、冯络满、杨旸、朱纹熠、徐莉、陈喆和杨小爽等同学曾参与第八章的资料翻译工作，在此亦表谢意。

作 者

目 录

第一章 人类发展观及其变化

第一节 从经济增长论到增长极限论.....	1
第二节 从循环经济论到人与客观世界相协调的发展观.....	4
第三节 面向后代与未来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	5
第四节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9
参考文献	14

第二章 全球化与性别公正

第一节 全球化对妇女发展的影响	16
第二节 性别公正成为全球共识	21
第三节 全球妇女运动	23
第四节 全球关注的十二类议题	27
第五节 案例分析	31
参考文献	35

第三章 性别平等发展的指数

第一节 人文发展指数的构成及其意义	38
第二节 性别发展指数和性别赋权指数	41
第三节 性别发展指数的计算	46
第四节 指数排序及其意义	49
参考文献	51

第四章 性别平等纳入决策主流

第一节 性别平等主流化及其意义	53
第二节 性别平等主流化的内涵	56
第三节 性别平等主流化的战略框架	57
第四节 性别平等主流化案例研究	62
参考文献	64

**第五章 从“妇女参与发展”到“性别与发展”**

第一节 妇女参与发展	66
第二节 “性别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72
参考文献	78

第六章 性别分析

第一节 性别分析的概念与内容	80
第二节 性别分析的运用及“参与式”	85
第三节 性别分析的案例介绍	89
第四节 经典性别分析工具简介	92
参考文献	102

第七章 性别计划

第一节 性别计划概念及其理论假设	103
第二节 妇女的角色与两种性别需求	107
第三节 性别计划的原则和过程	113
第四节 案例分析	115
参考文献	117

第八章 妇女赋权

第一节 妇女赋权概念的产生和发展	118
第二节 妇女赋权与社会环境	121
第三节 妇女赋权指标和监测、评估	125
参考文献	132

第九章 性别统计

第一节 性别统计的产生、发展和作用	133
第二节 性别统计内涵和特点	135
第三节 性别统计指标	137
第四节 性别统计的缺口	146
第五节 性别统计的生产过程	148
第六节 案例分析：中国的性别统计	150
参考文献	154

第十章 性别预算

第一节 性别预算的兴起、分类和目标	155
第二节 性别预算分析	158
第三节 性别预算的作用和进展	161

参考文献.....	164
-----------	-----

第十一章 性别与发展项目

第一节 性别与发展项目及其类型.....	165
第二节 项目过程的性别整合.....	168
第三节 性别敏感型项目的规划.....	172
第四节 性别敏感项目的监测与评估.....	175
第五节 项目建议书的写作与倡导项目的设计.....	178
参考文献.....	181

附录 1 中英文名词对照	182
--------------------	-----

附录 2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及测量指标	186
---------------------------	-----

附录 3 《北京 +10 宣言》	189
------------------------	-----

附录 4 全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重点监测统计指标(2003)	191
-------------------------------------	-----

第一章

人类发展观及其变化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发展观对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作用。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存在发展问题，发展始终是人类执著追求的一个最基本、最普遍也是最崇高的目标。在追求发展的漫长历程中，人类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特别是从工业革命开始，在改造自然和发展经济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与此同时，人类的发展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人口的迅速增长，自然资源的短缺和生态环境危机，等等。诸如此类问题迫使整个国际社会不断反省人类自身的实践，探寻未来发展的道路与趋势。

本章介绍了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人类发展观所经历的变化：从经济增长论到增长极限论，从循环经济论到人与客观世界相协调的发展观，从可持续发展观到以人为本的人文发展观，最后讨论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观。

第一节 从经济增长论到增长极限论

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人类发展观经历了经济增长论与增长极限论两个阶段。

一、以 GDP 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医治创伤、恢复经济建设成为世界各国的首要任务。在这一背景下，一部分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他们所理解的发展是在经济方面的变化，而且指的是在经济方面的正向的变化。如《大英百科全书》对发展的解释是：“虽然该术语有时被当成经济增长的同义词，但一般来说发展被用来描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包括数量与质量两方面的改善。”在认识上将发展等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又被称为经济增长论。这种发展观源于“二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论把发展等同于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其基本观点是：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动的中心内容；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第一”标志；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尺；发展规划是实现工业化和实施追赶战略的重要手段，作为政府对国家经济运行进行评价与诊断的重要指标——国内生产总值，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是否进步的最重要的指标，从而形成了以 GDP 或 GNP(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理念。

这一观点的主要特征是,突出发展的“经济性规定”和“经济化倾向”。其主要内容有:将工业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尺度,把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看作现代文明的重要特征。比如,把在达到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500 美元的水平以后,仍能以本国的力量维持 GDP 增长率每年 5% ~ 7% 的国家视为发达国家。这种发展观实质上是一种经济增长战略,希望通过经济单项突破的“涓流效应”和“扩散效应”,带动非经济部分的发展以及社会福利的增进。认为 GNP 的提高无疑会自动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可以消除贫困;经济发展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社会民主化;经济发展是平均分配的前提,能带动实现社会的其他目标。如联合国第一个十年发展计划(1961—1970 年)阐述的发展目标是:不发达国家的 GNP 年度增长率最低为 6%,并希望较贫困国家能通过经济增长来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

实践证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对促进经济增长、迅速积累财富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经济增长并不会必然带来收入分配的改善和社会结构的完善,不能反映技术进步的变化,也没有给人们带来所期望的福祉。沿着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思路走下来,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了,物质财富增加了,却造成了经济比例失调、贫富差距拉大、资源日益枯竭、环境日益恶化等严重的问题。20 世纪 60 年代后,环境污染的程度加重。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油价的行动在发达国家引发了一场“石油危机”,人们终于意识到经济增长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意识到环境污染对人类生活的危害,开始对传统的发展观产生了怀疑。

传统的经济增长观的缺陷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是认为物质财富增长所依赖的资源在数量上是不会枯竭的。实际上,由于人类所拥有的资源以及资源的潜力是有限的,以 GNP 为中心的发展受资源的限制,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很难获得足够的资源以满足这种发展的需求。二是这种发展观没有顾及经济增长带来的自然和环境方面的代价问题,没有强调从“人的活动及其能力”出发来研究发展。三是 GNP 的增长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真正消除贫困^[1]。

二、增长的极限

20 世纪 60 年代,正当工业国家陶醉于战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随之而来的“高消费”的黄金时代时,资源、环境、人口等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日益尖锐和全球化,所谓的“人类困境”问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

(一)《寂静的春天》

1962 年,一本读后令人毛骨悚然的作品登上了美国畅销书的排行榜,书名为《寂静的春天》^[20],美国自然作家、当代环保主义的先驱——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于 1962 年出版的一部关于杀虫剂、特别是 DDT(一种剧毒农药)对鸟类和生态环境造成的毁灭性危害的著述。它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以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断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作者从美国许多地方春天不闻啼鸟声的异常景象入手,用大量活生生的事实描述了农药污染所带来的严重危害:本来生机蓬勃的春天,却呈现出一片“寂静”。卡逊在书中描述了 DDT 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即使在夏天,皮肤沾染过多的 DDT 也会致命;喷施 DDT 的地方,小鱼儿都会成批死掉,美丽的小溪没有一点生机;它让小蝌蚪死去,令吃过含有 DDT 的昆虫和鱼虾的鸟类产下孵化不出小鸟的卵;DDT 的残余毒性能长达 10 年之久,一些微量的毒素也会损害生物的遗传基因。从地表水、土壤到鱼儿、鸟儿……甚至人类,无不遭到来自这种剧毒杀虫剂

的严重危害,鸟儿不再歌唱,春天从此寂静,大自然开始反抗。在书中,卡逊告诉人们:“现在每个人从胎儿出生直到死亡,都必定要和危险的化学品接触,这样的情况在世界史上还是第一次。”在书中作者表达了挑战世俗的世界观:“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她告诫人们,“用于对付昆虫的化学武器,现在已经转过来威胁我们的整个大地了,这真是人类的巨大不幸”^[2]。

在这本书刚出版时,卡逊曾遭到了围攻和批判,尽管如此,历史的进程还是证明了她作为环境保护先驱的价值。《寂静的春天》被认为是20世纪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书。这本书的重要性在于它改变了美国人,甚至全世界人对于周围事物的看法,改变了人类以往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地对待我们生存的地球的态度。美国前总统阿尔·戈尔在其给《寂静的春天》所写的再版序言中称:“它是一座丰碑,它作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1962年,当《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出版时,公共政策中还没有‘环境’这一条款……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许到现在还没有开始……《寂静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并且已经深深植根于广大民众中……她的声音永远不会寂静。《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作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开始。”

自《寂静的春天》问世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更加深入、广泛的对人类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反思、总结和探索活动。

(二) 罗马俱乐部

1968年,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的几十名企业家和学者聚集在罗马,共同探讨人口、工业发展、不可再生资源、粮食、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关乎经济增长和人类命运的根本性问题,并对原有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这批人士的聚会后来被称为“罗马俱乐部”。罗马俱乐部是一个非正式的国际协会,其宗旨是促进人们进一步认识全球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经济的、自然的、政治的、社会的等子系统,从而促进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4年后,即1972年3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丹尼斯·米都斯(Dennis L. Meadows)教授领导的一个17人小组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一篇题为《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的研究报告。这项研究耗资25万美元,最后得出如下结论:地球资源是有限的,人类必须自觉地抑制增长,否则随之而来的将是人类社会的崩溃。该书的副书名为“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全书分为“指数增长的本质”、“指数增长的极限”、“世界系统中的增长”、“技术和增长的极限”、“全球均衡状态”五章,从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环境污染几个方面,阐述了人类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给地球和人类自身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书中以各种数据和图表有力地证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但使人类与自然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而且将使人类继续不断受到自然的报复。报告根据数学模型预言:在未来的一个世纪,人口和经济需求的增长将导致地球资源耗竭、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除非人类自觉限制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否则这一悲剧将无法避免。该书还指出,“改变这种增长趋势和建立稳定的生态和经济环境,以支撑遥远未来的发展是可能的”,而且,“为达到这种结果而行动得愈快,这种改变的成功可能性就愈大”。报告也给出了一个激烈的解决方案,即零增长。这篇研究成果发表后,立刻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这一理论又被称为“零增长”理论。

零增长理论又被称为增长极限论。它认为,人口增长、粮食生产、投资增长、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具有按指数增长的性质,如果按这个趋势继续下去,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在未来

100年内的某个时期将达到极限,原因在于地球是有固定大小的,人类生活的空间是有限的,资源是有限的,地球“吸纳消化”污染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增长极限论认为,世界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极限,人类应制止增长以及技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人类必须注意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应该考虑资源环境的最终极限对人类发展和人类行为的影响^[3]。

就世界范围而言,市场经济引导的全球性“增长热”,现代高科技引导的高速工业化,带来了不可再生性能源与资源的巨大耗费;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以上种种问题引起了对《增长的极限》的讨论。这种单纯经济增长模式在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挫折,促使人们重新探索发展的含义。人们开始认识到,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等于发展,要想发展得又快又好,不仅要注意经济增长,而且要注意解决人口、就业、保健、教育、道德观念、政治体制、分配制度等方面的问题。

增长极限论较之于单纯的经济增长论来说是一种进步,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逐步被世人所接受。然而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即它以“增长—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将人置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忽视了人类把握自己命运和行为的能动作用,忽视了技术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由于“零增长”理论认为,“人口的出生率应该等于死亡率,资本的投资率应该等于折旧率;资本与人口的比率分配,必须与社会一致”,因此罗马俱乐部被认为是研究世界未来的典型的悲观派的代表。对此理论界仍有争议。有人甚至写过一本《没有极限的增长》来进行反驳,尽管如此,《增长的极限》这本书仍可以说是人类对高生产、高消耗、高消费、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模式的首次认真反思,它的论证为后来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奠定了基础。《增长的极限》和罗马俱乐部一起成为环境保护史上的一座里程碑^[2]。

20年后,也就是1992年,《增长的极限》的作者唐奈勒·H.米多斯、丹尼斯·米都斯和约恩·兰德斯发表了他们的新著:《超越极限——正视全球崩溃,展望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被称为《增长的极限》的更新版本。在这本书中,作者们郑重声明:该书所阐述的只是警告,不是悲观的预测,更非判决,它要求人类做出选择,那就是走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增长存在极限,发展却不存在极限”。《超越极限》超越了《增长的极限》。

第二节 从循环经济论到人与客观世界相协调的发展观

进入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的第一个发展计划受到了严厉批评。主要批评意见是,由于这个计划严重忽视了环境、资源因素以及社会发展的内容,经济增长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状况没能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而改善,出现了“没有发展”的增长局面。个别国家甚至还出现了“贫困性增长”的局面。鉴于此,联合国在制定第二个发展十年规划时,把推动社会发展当作发展的主题。

一、生态型资源循环利用——循环经济的发展观

“循环经济”一词,是由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它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